

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

主编 苏晨

副主编 杨明新

学术专集

学士



杨明新 苏晨 学士 学术专集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16开 128页 3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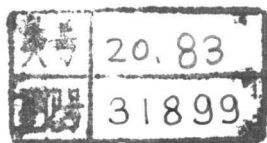
X

U

E

T

U



學士

广 东 高 等 教 育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学士/苏晨主编.-广州: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,1996.2

ISBN 7-5361-000002

I. 学… II. 苏… III. 社会科学-文集 IV. C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96) 第02094号

1996.11.25

三联韬奋图书馆

0012130228

学 士

卷 一

苏 晨 主 编

*

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华苑印刷公司印刷

850 × 1168 毫米 32开本 7.5印张180千字

1996年3月第1版 1996年3月第1次印刷

ISBN7-5361-1874-6 / Z. 31

定价: 23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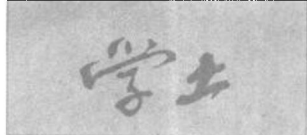
主 编：苏 晨
副 主 编：杨 明 新
责 任 编 辑：吴 海 燕
特 约 编 辑：陈 肩
美 术 总 体 设 计：陈 健 麟
美 术 编 辑：廖 耀 雄
电 脑 制 作：陈 瑞 淞
李 丽 珊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1 | 谁扼杀了戊戌维新？ | 赵立人 |
| 18 | 记后汉元初子游残碑 | 罗振玉 |
| | 附：编者说明 | |
| 25 | 李审言交游书札选存(一) | 陈衍等 |
| | 附：李稚甫、章文钦说明 | |
| 50 | 水关记与象山书院碑记 | 郭尚先 |
| | 附：郭风说明 | |
| 52 | 《沈曾植文集》前言 | 钱仲联 |
| 69 | 论李审言《愧生余录》 | 蔡文锦 |
| 83 | 罗振玉篆刻 | 罗继祖 |
| 89 | 余之改过实验谈 | 弘一法师 |
| | 附：张人希说明 | |
| 107 | 动容貌·正颜色·出辞气 | 于省吾 |
| 111 | 雕虫小言 | 容 庚 |
| | 附：编者后记 | |

AAH184/05

XUETU

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132 论怀素草书 | 商承祚 |
| 135 《金石家翰墨》序 | 潘景郑 |
| 137 溥心畲《寒玉堂诗集》评价
及其他 | 钱今凡 |
| 159 大汕的澳门南海航行与唐船贸易
圈中的禅宗信仰妈祖礼拜 | 姜伯勤 |
| 191 跋明黄君蒨刻本《水浒牌》 | 王贵忱 |
| 196 关于王韬与罔千仞 | 郑海麟 |
| 208 人格气节·忧患安乐 | 金铁纯 |
| 215 傅山的书法和学行 | 叶耀才 |
| 223 发财刻书甚可嘉 | 王 午 |
| 231 《学土》卷一编后 | 苏 晨 |
| 封面封底国画 | 王璜生 |



谁扼杀了戊戌维新



戊戌维新是一场涉及政治、经济、文化领域的全面的改革运动，它的失败的长远影响，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推迟了大半个世纪。过去，人们都很自然地指慈禧为扼杀维新的罪魁祸首。此见自非无据，因为确是慈禧发动政变，囚禁光绪，捕杀新党，中止新政。但再作深一层的分析，事情就显得远非那么简单了。

从本质上说，慈禧自然是一个保守派，倘若天下太平无事，她是尽可能维护祖宗成法的。对她来说，最重要的是保住自己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和骄奢淫逸的生活，而不是保住祖宗成法。这是这个没有文化的寡妇和那些八股出身，满脑子“严

XUEBU

夷夏之大防”的顽固派官僚的不同之点。

慈禧懂得“两害相权取其轻”的道理。当她1861年发动政变夺取政权之际，面临着太平军的严重挑战，尽管她内心对汉人的疑忌根深蒂固，却仍对重满轻汉的祖宗成法作出重大修正，提拔和重用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等一批汉族官僚，最终消灭了太平军，挽救了大清江山，同时也保住了自己的权位。出于同一目的，同治初年，她又克制了自己对“洋鬼子”的反感，同意聘用洋人，设机器制造局、轮船招商局、纺织局，派留学生，开同文馆，由此开展了学习西方科技的“自强新政”。

甲午战争的失败，对慈禧是一个猛烈的冲击。面临国破家亡的危机，慈禧即使纯从维护一己私利的目的出发，也不可能不考虑深化改革，变法图存。

人所共知，戊戌维新时期慈禧虽已归政于光绪帝，但实际上仍紧握大权。显然，倘若慈禧如传统观点所说，一开始就坚决反对变法维新的话，那么，从《明定国是诏》开始的一堆变法诏书，根本就不可能颁发下来。

1898年1月29日，康有为递《上清帝第六书》，3月11日上达光绪帝。其后，康有为又陆续呈递了4件变法条陈，还有4部鼓吹变法的新书，即康有为编写的《俄彼得变政考》、《日本变政考》和李提摩太编译的《泰西新史揽要》、《列国变通兴盛记》。4月13日，光绪帝命将康有为所上新政条陈和新书全部“恭呈慈览”^[1]而“太后亦为所上之书感动”、“命总署五大臣详询补救之方、变法条理，太

后曾有懿旨焉。”^②费行简说：

后尝告德宗，变法乃素志，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，派子弟出洋留学，造船、制械，凡以图富强也。……适德人假细故攘我胶澳，举朝无一策，帝复泣告后，谓不欲为亡国之主。后曰：“苟可致富强者，儿自为之，吾不内制也。”^③

6月1日，由康有为代拟的杨深秀《请定国是明赏罚以正趋向而振国祚折》递上，6月8日(四月二十日)，由康有为代拟的徐致靖《请明定国是折》递上。两折都在当日“恭呈慈览”，慈禧也马上作出积极反应，翁同和记：“四月二十二日……上奉慈谕，以前日御史杨深秀、学士徐致靖言国是未定，良是。今宜专讲西学，明白宣示等因。并御书某官应准入学，圣意坚定。”^④同一日，光绪帝即发布标志百日维新开始的《明定国是诏》。由此看来，百日维新不仅不是光绪帝背离慈禧旨意的行动，而恰恰是奉“慈谕”后才开始的。无疑，光绪帝变法的积极性远远高于慈禧，但是，没有慈禧的允许甚至指令，光绪帝根本无权开展变法。

慈禧宠臣荣禄在光绪帝诏定国是后，即出任直隶总督、北洋大臣，7月17日，递《为时事多艰特保人才以备朝廷任使折》，推荐一批“通贯中外、因时济变之才”，其中有被荣禄评为“操履清严，识量宏远”的陈宝箴，评为“气度沉凝，学有根柢，外洋法制，言皆有物，不事浮夸”的黄遵宪，还有曾

保奏康有为的张百熙^[5]。时陈、黄在湖南倡导维新甚力，守旧派狂吠不已，而荣禄评价如是之高，亦足以间接反映慈禧当时对变法维新是认同的。

康有为记：“五月初五日，奉明旨废八股矣。先是，二十九日芝杨(宋伯鲁)折上……故待初二日诣颐和园请太后懿旨，而至初五日乃降旨也。百事皆如此。”^[6]

8月29日，光绪帝将一道裁撤冗官的朱批谕旨送呈慈禧，而“西后不肯裁漕”^[7]光绪帝只好又下令在谕旨所提及应裁的冗官中，删去“漕运总督及卫所各官”^[8]。可见，百日维新时期颁布的所有新政谕旨，几乎无一不经过慈禧的审批。百日维新期间，光绪帝曾12次赴颐和园见慈禧请训，也说明慈禧始终掌握国家大事的最终决定权。

至于慈禧坚决反对的政令，根本就不可能出台。最明显的是开懋勤殿的计划，它由康有为提出，目的是建立一个由康有为、梁启超等人组成的新权力中心，来取代由慈禧实际控制的原有中央机构。光绪帝接纳了，但在送慈禧审批时却触礁了：

上意仿照先朝懋勤殿故事，选举英才，并延东西洋专门政治家，日夕讨论讲求治理，从康请也。蓄心多日，未敢发端，恐太后不允，至是决意举办；令谭嗣同引康熙、乾隆、嘉庆三朝谕旨拟诏，定于二十八日(9月13日)赴颐和园时，禀请太后之命。太后不答，神色异常，惧而未敢申说。皇上自四月以来，所有举办新政，莫不先赴太后前禀白，而从宣示，虽假事权，并未敢自



谁扼杀了戊戌维新

专也。每有稟白之件，太后不语，未尝假以辞色；若遇事近西法，必曰：“汝但留祖宗神主不烧，辮发不剪，我便不管。”^[9]

关于这一次冲突，光绪帝本人在9月15日给杨锐的手诏中说：“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，不愿将法尽变，并不愿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，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，令其议政，以为恐失人心，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，而并且有随时机谏之事。但圣意坚定，终恐无济于事。即如十九日(9月4日)之朱谕，皇太后已以为过重，故不得不徐留之，此近来实在为难之情形也。……但必欲朕，早痛切降旨，将俾法尽变，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，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。果使如此，则朕位且不能保，何况其他？今朕问汝，可有何良策，俾旧法可以渐变，……而又不致有拂圣意。”^[10]

何以此前光绪帝的各项改革措施绝大多数都能获得慈禧允准，但一到提出“开懋勤殿”，慈禧就大光其火呢？道理很简单，因为光绪帝其实一直都是傀儡，很多看来很激进的变法措施，只要不向慈禧实际上的最高权力挑战，慈禧都不妨让光绪帝试试，反正出了麻烦，责任是光绪帝的，办好了慈禧则坐享其利。但开懋勤殿却完全不同，它意味着光绪帝要建立自己名副其实的权力中心，而把慈禧操纵的原班人马撤到一边，这当然是她决不能容忍的。

至于说慈禧“不愿将法尽变”，确是事实，但这并不等于她当时就完全反对变法；而且，结合实际情况来看，慈禧持此态度，实亦不无道理。



光绪帝锐意变法，精神固然可嘉，但他政治经验不足，很多变法措施未免操之过急。试以因慈禧提出异议而不得不删改的裁冗上谕为例，裁汰冗官，固然是当务之急，但必须统筹全局，妥善安置。骤然实行“休克疗法”，必致人心瓦解，社会动荡。事实正是如此，在下诏裁官的同时，并未指示任何善后办法。有当事人记当时情况，谓“戊戌变政，首在裁官。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，不下十余处，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，将及万人。朝野震动，颇有民不聊生之戚”^[1]。由此看来，慈禧对此谕旨之过于操切提出异议，并无不妥，实际上，经修改后的裁冗谕旨仍然过激。

诚然，戊戌政变后，慈禧把绝大多数的新政废除了，与她在变法初期赞同新政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。但这是不难理解的：慈禧本来被康有为的建议“感动”，愿意尝试新政来挽救自己的危亡；到头来，她竟发现康有为企图通过新政从她手上夺权，甚至要派兵围颐和园，要她的老命，而发明西法的洋人又公然干预中国事务，公开庇护和救援康党，更令她怒不可遏。在如此巨大的心理冲击下，她转而对新政恨之入骨，下令废除，正在情理之中。

不过，废除新政之后，慈禧就要重新寻求自强的法宝了。这样的法宝不久就找到了，那就是义和拳的“神术”。多次耳闻加上一次目睹之后，慈禧对“神术”深信不疑。采用义和拳的“神术”，既能御外侮，救危亡，又不必改变中世纪的宗法统治及其全部价值观念，比起采西法自强，自然理想得多。直到惨痛的事实证明“神术”不灵，她才醒悟过来，老羞

成怒，下令对“拳匪”“痛加剿洗”。从1901年开始，戊戌变法中的各项改革又一一复活了。不同的是，戊戌中的变法措施绝大多数都未及实行，这一次却基本落实了，而且很多方面都较戊戌时更为激进，甚至连行立宪、开国会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，可惜此时国家已元气大伤，人心丧尽，这一切都无补于事了。

庚子浩劫之后的一整套新政当然不表示慈禧已是改革派，甚至不表明她变得开明了。在内心深处，慈禧丝毫未改。她之所以推出新政，与其先是镇压义和拳、随后又加以支持，最后仍残酷镇压一样，也与其戊戌年间先是支持康党的主张，其后又捕杀康党一样，同是巩固自己权势的应变措施。

不过，慈禧的这种“务实”态度，提供了一种现实的可能性，即：如果维新派在戊戌变法中，不试图去触动慈禧的权力，而是借助她的权力推动变法，那么，戊戌维新取得较大的成果，避免后来的悲剧结局，并非不可能。故王照谓：“戊戌之变，外人或误会为慈禧反对变法，其实慈禧但知权利……若奉之以主张变法之名，使得公然出头，则皇上之志可由屈而得伸，久而顽固大臣皆无能为也。”“此策曾于余之第一奏折显揭之，亦屡向南海(康有为)劝以此旨，而南海为张荫桓所蔽，坚执扶此抑彼之策。”^[12]其他人也说：“光绪戊戌政变，言人人殊。实则孝钦并无仇视新法之意，徒以利害切身，一闻警告，即刻由涇园还京。”^[13]

既然慈禧本来不是维新的障碍，康有为为何不听王照的劝告呢？此中另有原因。

早在1895年6月间，康有为就曾表示：“然苟不能为张柬之之事(按张柬之废武后，扶唐中宗复辟)，新政必无从办矣。”^[14]1898年7月8日，文梯上《严参康有为折》，谓“康有为又曾在奴才处手书御史名单一纸，欲奴才倡首鼓动众人，伏阙痛哭，力请变法。……乃杨深秀旋即便服至奴才处，仍申康有为之义。且奴才与杨深秀初次一照，杨深秀竟告奴才以万不敢出口之言，则是杨深秀为康有为浮词所动，概可知也”^[15]。

《康南海自编年谱》亦记此事，谓：“时御史文梯素托大言，……劝共联入乾清门，伏阙痛哭，请拒俄变法，……乃为文梯草折。及彼上时，自改请令使俄辩之，若不许，则自刎俄人前。”^[16]文梯的《请拒俄联英折》是1898年3月26日递上的^[17]，而俄舰入旅顺湾，占据旅大，事在1897年12月15日，文、杨之谈话，当在此两日期之间。

至其具体内容，因事体严重，文梯未公开，当系拟待召对时再密奏，倒是梁启超透露了一点真相(当然经过歪曲)：

御史文梯满洲人也，……经胶旅后，虑国危，……适同侍祠，竟夕语君(杨深秀)宫中隐事，……因慷慨诵徐敬业《讨武氏檄》“燕啄王孙”四语，目眦欲裂。君美其忠诚，乃告君曰：“……若有志士相助，可一举成大业，闻君门下多识豪杰，能觅其人以救国乎？”……君告先生(康有为)以文有此意，恐事难成，先生见文则诘之，文色变，虑君之泄漏而败事也，……乃露章劾君与彼有不可告人之言，……政变后之伪谕，谓康先生谋围颐和园，实

自文梯起也。^[118]

胡思敬《戊戌履霜录》亦记：

深秀尝与文梯值宿斋宫，尽闻宫中隐事，夜半奋髯起曰“八旗宗室中，如有徐敬业其人，我则为骆丞(宾王)矣。”^[119]

梁、胡政治立场相反，而所述大体相同，可证确有其事。另据记载，杨深秀还对文梯说：“此时若有人带兵八千人，即可围颐和园，逼胁皇太后。”^[120]类似的话，他大概对其他人也说过，故又有记载谓：“深秀以常言得三千杆毛瑟枪围颐和园有余也。”^[121]

以上资料表明，康有为其实早就有意推翻慈禧的统治，并向杨深秀透露其意图。而“杨深秀为康有为浮词所动”，百日维新开始前数月，就已着手物色“围颐和园”的人选了。

1898年6月11日，光绪帝诏定国是，6月16日，召见康有为。“康被荐召对，即变其说，谓非尊君权不可，……及叩尊君权之道，则曰非去太后不可。”^[122]按常理说，康有为既然“感动”了慈禧，又蒙光绪帝召见，通向他梦寐以求的权力之路应该畅通无阻，那个扮演张柬之的行险侥幸之计，应该束诸高阁了。但事实不然。首先是因为康有为鼓吹“孔子改制”，俨然以“后世素王”自居，以此深为朝中高官厌恶。翁同和、孙家鼐读过《孔子改制考》后，翁同和说：“此人居心叵测。”^[123]孙家鼐则指康有为“蛊惑民志，是道天下于乱也”^[124]其他本来就深恶康有为的徐桐等人就更不用说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康有为想凭正常途径升迁谈何容易！事实

上，百日维新期间，康有为、梁启超都一直屈居下僚，开制度局或懋勤殿以夺取权力的方案又屡被慈禧否决，要飞黄腾达，只有寄望于军事密谋。另一方面，康有为本性喜动不喜静，没有按部就班，等待升迁的耐心，非要惊世骇俗“一举成大业”不可。慈禧是否赞成变法，已并非康有为要考虑的问题了。

要“一举成大业”，关键是“渐选将材以得兵权”^[25]。康有为的首选是袁世凯，康自称：“先于六月令徐仁禄毅甫游其幕与之狎，以观其情，袁倾向我甚至，……毅甫归告，知袁为我所动，决策荐之。”^[26]叙事不实不尽，为康氏特色，王照所说，就大不相同：

在袁氏奉诏来京(按事在9月14日)之十日前，南海托徐子静及谭复生(嗣同)、徐蚩甫(原注：子静名致靖，蚩甫，子静次子仁镜也)分两次劝余往聂功亭(士成)处，先征同意，然后召其入观，且许聂以总督直隶，余始终坚辞，部有“王(小航(照)不作范睢)”语(按：范睢说秦王除太后党)。……世人或议世凯负心，殊不知即召聂召蚩，亦无不败。……后乃知往小站征袁同意者，为子静之侄义甫(原注：义甫名仁录。按：即康有为所谓“徐仁录毅甫”)，到小站未得见袁之面，仅由其营务处某太史传话(原注：某太史今之大伟人。按：指徐世昌)，所征得者模棱语耳。夫以死生成败关头，而敢应以模棱语，是操纵之术，已蓄于心矣。^[27]

王照提及的“招蚩”之义，亦见于其他记载。胡思敬《戊

戊履霜录》谓，谭嗣同“密谋招袁世凯入党，用所部新建军围颐和园，以兵劫太后，遂锢之，……以告梁启超、林旭，启超称善，旭言袁世凯巧许多智谋，恐事成难制，请召董福祥，嗣同不可。”^[28]梁启超《戊戌政变记》谓：

时袁世凯方在京，谋出密诏示之，激其义愤，而君(林旭)不谓然，作一小诗代简致之谭等曰：“伏蒲泣血知何用，慷慨何曾报主恩。愿为公歌千里草，本初健者莫轻言。”^[29]

此诗并见于《晚翠轩集》及《闽侯县志》，惟略异，《闽侯县志》并指出“千里草指董福祥”。^[30]又魏元旷《坚冰志》亦记：“谭嗣同以袁世凯可属大事，谋使以兵劫颐和园，先行废杀，乃临朝堂大诛拒命者。林旭以诗止之曰：本初健者莫轻言。”^[31]

又毕永年记：

八月初(9月16日)，仆见谭君，与商此事。谭云：“此事甚不可，而康先生必欲为之，且使皇上面谕，我将奈之何？”

9月19日，毕又问谭：“袁究可用乎？”谭答：“此事我与康争过数次，而康必欲用此人，真无可奈何！”^[32]可见召袁之计出于康而非出于谭，与康之自述相同。胡、魏所记不确。

由上述资料可知，康党在百日维新期间，曾在袁、聂、董三人中考虑选择一个执行“围园”使命，袁态度暧昧，但聂、董更难利用，故最终还是选定了袁，而有召袁入京，夜告密谋之举。与此同时，康有为又劝诱湖南哥老会首领毕永年